



中國 青年行動者 年度報告

(2019年)

Young Activists Alliance
2020年1月編寫



目 錄

報告簡介	1
編者說明	4
第一部分 中國青年殘障行動者報告	5
一、主流殘障組織的轉變	5
二、新型青年殘障組織的誕生和發展	6
三、青年殘障組織及個體行動者的行動	7
四、青年殘障行動者的機遇、挑戰和出路	9
第二部分 中國青年女權行動者報告	11
一、青年女權行動者的群體面貌	11
二、青年女權行動者的行動和組織	12
三、官方的管控與壓制	13
四、青年女權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14
第三部分 中國青年勞工行動者報告	16
一、青年勞工行動者的群體面貌	16
二、青年勞工行動者的行動和組織	17
三、官方的管控與壓制	18
四、青年勞工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19
第四部分 中國青年性少數行動者報告	20
一、青年 LGBT+行動者及組織	20
二、青年 LGBT+行動者的行動	21
三、青年 LGBT+行動者的挑戰	23
四、青年 LGBT+行動者的需求和出路	24

報告簡介

本報告的研究對象為中國的青年行動者，這裡的「青年」泛指 1990 年之後出生的青年人，而「行動者」則是指以各種線上或線下、個人或集體的方式，爭取社會、制度或政策的改變，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士。為了方便討論，本報告會以各自關注的主要議題來命名不同的群體，包括青年勞工行動者、青年性少數行動者、青年殘障行動者、青年女權行動者等。當然，各個群體之間的界限並非絕對，群體成員也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疊。

內容方面，本報告按照群體的不同共分為四個部分，每個部分均涉及四個方面的內容，分別是青年行動者的整體面貌和群體構成，青年行動者 2019 年開展的行動和現存的組織形態，官方在制度和手法上對青年行動者的管控和打壓，以及從發展公民社會和推動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青年行動者及其外部支持者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四個部分均由各議題領域的行動者或觀察者撰寫，以下為內容摘要。

中國青年殘障行動者

近些年來殘障組織的生存狀態可總結為，權利型組織幾近覆沒，僅存的組織將政策倡導的工作重心轉移向社區組織實踐；主流殘障組織以基金會、社會企業、服務型企業的樣態開展工作，工作的主要方式為培育基層組織、進行媒體傳播和公眾教育、為企業和雇主提供直接就業服務。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許多青年殘障者開始探索以多樣化的組織形式來探討殘障群體權利和進行權利倡議，比如擁有 700 多位活躍線上社群成員的線上青年殘障組織 S 和中國首間鮮明強調「殘障」和「女性」雙重弱勢身份的公益機構 B。

2019 年，青年殘障者和組織行動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展覽、舞臺劇、廣播、新媒體、口述史、紀錄片等方式講述個人和群體的生命故事，從而激發群體的身份認同和進行公眾教育。同時他們也會在具體權利議題比如高校碩士招生歧視聽障人士、教師招聘歧視視障人士上面進行個案支持和政策倡導。另外，B 組織在 2019 年發佈了中國殘障女性需求報告，報告呈現了職場無障礙環境不完善、招聘差別對待和同工不同酬等就業歧視，以及受教育權利的支持不足等問題，為政府部門支持和完善助殘公益服務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雖然政府允許民間獨立力量生存的空間日益狹小，但青年殘障行動者個人卻鮮受來自地方政府或所在高校的管控，主要原因是他們的行動方式主要是線上而非線下，當局傾向於把殘障群體的訴求當作福利性需求而非權利性需求，同時當局也傾向於採用可持續發展目標而非人權標準的話語框架去看待殘障議題。對青年殘障行動者來說，不易的成長經歷讓他們對於政治風險和外部支持都比較警惕。雖然青年殘障組織大多面臨資源匱乏的問題，但資金支持未必是對青年殘障者的最好幫助。外部可以通過技能培訓的方式，讓他們可以更好地運用故事講述和基礎調研的方式去行動。

中國青年女權行動者

2019 年，中國官方沿用並加強了對於青年女權行動者的管控手段。最頻繁使用的手段是通過警察和國保部門對行動者周圍的人員進行騷擾，包括房東、父母、親戚等。除了騷擾周遭人員，對女權行動者本人的約談和施壓的強度也大大增加。2019 年新增加的管控手段還包括在行動者居住的社區、電梯口等地方設置監控攝像頭，以此進行行程和來往人員的監控。2019 年最值得注意的管控方式是對有行動導向的個人和組織進行針對性的打壓，通過密集的騷擾，將女權行動者的組織打散，讓組織消失，讓個人處於孤立的狀態。比如 MeToo 運動之後對相關組織的有針對性的施壓、在輿論上進行汙名化，讓很多機構被迫紛紛關停。

相較于 2015 年前的高調挑釁，如今的環境讓行動者的行動策劃和組織動員被迫變得更加低調和分散，這也使得大家調整了策略。在行動動員層面，大規模動員異常艱難且風險巨大，不過行動者們依然會抓住時機果斷出手。2019 年關於性騷擾、家庭暴力等議題的熱點事件依然頻發，行動者們會積極跟進事件，通過線上直播、及時組織線上討論的方式來深化社群和公眾對這些議題的理解。她們也會通過撰寫文章、製作電臺節目、錄製音頻課程的方式來理清論述、深化討論，還會通過許多跨組織、跨領域合作的嘗試，來重新整合資源和開拓新空間。在具體的性別議題操作層面，女權行動者在就業性別歧視、單身女性生育權、性騷擾三個特定議題上面進行了深耕。在具體的個案跟進方面，行動者們採取了兩種策略。一是繼續通過擴大個案的公眾影響和法律影響來提高公眾意識和推進政策和法律的改變；二是提供具體的、陪伴的個案服務。在社群建設方面，雖然很多城市的線下活動頻頻遭遇阻撓，但是行動者們還是探索出了許多創新的方式讓青年女性形成線上和線下的聯結。另外還有許多行動者在海外培育中國留學生社群用以回饋中國的女權運動，其中一些人在反性騷擾運動當中組織了大規模的動員活動。

中國的青年女權行動者亟需得到來自各方的支持，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資源和資金的支持，讓運動可持續，讓行動者不再處於脆弱的處境當中；二是對於行動者的心理健康資源的投入，讓行動者可以及時處理政治創傷，找到動力繼續開展工作；三是安全和風險方面的支持，讓加入運動或者想要加入運動的行動者可以獲得比較充足和完整的安全培訓，在將來的工作當中可以有應對的方法和預防機制。

中國青年勞工行動者

在 2018 年佳士工學運事件後，高校左翼社團受到了嚴重摧毀，可以說是「連根拔起」，左翼青年也被公安和學校作為重點關注對象予以全方位管控，有的甚至還遭到刑事抓捕。除此之外，約談、要求刪除在社交媒體發佈的文章和言論、進行思想教育等管控手段也都繼續得到沿用。高校也越來越普遍地利用科技手段和學生力量去實現其管控目標，比如人臉識別系統和學生信息員制度。在高校以外，打壓逐年升級。2019 年被官方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關押的勞工人士的人數比過去任何一年都要多，很多勞工機構被迫關閉或轉型。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沉寂」可謂是左翼青年 2019 年後半年的主要生存狀態。他們很少參加公開活動，即便參加左派或勞工的活動，也會以化名出現。這樣做雖然可以保護他們在有限的空間裡存活下去，但同時也使得他們與外界隔絕。從組織形式來看，高校左翼社團受到打壓後已經不能繼續以社團名義在校內公開舉辦活動，但仍有少數學生在校外舉辦學習小組或低調進行各類活動，比如為學校附近的工人舉辦文娛活動、法律講座，利用寒暑假進入工廠打工並開展調研、組織工人工作。另外也有一部分剛畢業的青年人選擇加入官

方的工會系統，一方面瞭解它的運作，另一方面嘗試去改變工會不為工人辦事的現狀，不過他們最終都因為受到工會的種種限制而選擇離開。非左翼青年方面，有專職工作的人會利用業餘時間持續而深入地參與具體公共事件，在校學生則會通過實習、兼職或志願服務的方式參與勞工機構的工作。

如今，很多勞工機構不能夠再以組織的名義開展工作，而只能以個人名義、非公開的形式。這樣的變化導致勞工機構和青年行動者互相看不見，結果是青年行動者的參與途徑比以往減少，獲取相關資訊變得更加困難，無形之中為青年行動者的參與增加了障礙和門檻。因此，未來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是讓青年行動者和勞工機構多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結。另外一個發展方向是搭建更多平臺將勞工議題和其他議題的行動者聯合起來，跨領域的交流和學習將有助於勞工議題的行動者從自我封閉的隔絕狀態中走出來，也有利於意識和能力的提升。

中國青年性少數行動者

LGBT+青年行動者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在校參與校園同志小組的大學生，二是參與到民間同志機構志願者的大學生和剛畢業不久的在職人士。根據對中國 50 個高校同志團體的調查，校園青年 LGBT+團體目前主要以某一高校獨立運作的學生小組為主，其中也有 14%為跨校的聯合小組。它們中有 80%成立於近 5 年內，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和武漢、西安等城市。在 50 個高校同志小組中，不到一半的同志小組在校園裡能與其它學生社團一樣順利註冊，多數小組無法註冊或註冊後被強制註銷。由於沒有社團的「合法」身份，他們在校園裡開展活動遇到較大的阻力，無法公開在校園裡招收新成員，無法使用校園教室舉辦活動，無法在校園內舉辦講座或大型活動，否則會面臨被輔導員或團委老師約談的風險。

在面對各種外部壓力的情況下，青年 LGBT+行動者及其團體仍大量堅持著校內外的行動組織及參與，活動內容包括同志學生社群發展、公眾教育/知識普及、性與性別相關的研究、議題政策倡導、學生團體網絡支持等。比較突出的是，青年人十分擅長通過網絡介入公共議題，並有意識地利用個體行動帶動公眾參與。比如，在 2019 年 11 月的《民法典》同性婚姻倡導行動中，大量參與動員的志願者均是在各同志機構充當志願者的年輕人。他們一方面利用自身在網絡上的傳播技能進行網絡動員，另一方面在線下帶動更多在地社群參與，最終帶動了 18 萬 8 千多人參與到該立法過程中。這在中國同運參與立法的歷史上是重大的突破，許多參與者表示，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與中國的立法進程。

隨著公民社會行動空間日益收縮，許多 LGBT+ 公益機構的活動受到較大影響，各機構均採取較為保守的行動策略，少有過去幾年較公開的倡導行動。低調開展工作的影響之一便是青年行動者的參與缺乏成熟的平臺。因此，在未來的時間裡，外界支持者需要搭建更多青年行動者與同志 NGO 互動合作的平臺。同時，面對有限的空間，需要培養青年行動者持續深耕具體議題的心態，提升他們對大陸同志運動歷史和現狀、所處社會及政治環境、具體同志議題的認知，培養他們在充滿衝突和割裂的社會及運動文化之下開展對話、協作討論的能力，並創造更多行動者之間相互陪伴和支持的機會。

編者說明

本報告的編寫初衷在於幫助外界全面瞭解中國各領域青年行動者的行動和組織狀況，以及當下面臨的挑戰和困難。不過由於人力和資源有限，本報告暫時無法涉及所有領域的青年行動者。對於這一局限性，我們十分希望往後的年度報告可以得到加強和補充。如對本報告有任何疑問或意見，歡迎致信 youngactivists20192019@gmail.com。感謝您的閱讀！

第一部分 中國青年殘障行動者報告

作者：中國殘障運動觀察者

近些年來，中國政府對民間社會尤其是權利組織的打壓，無疑造成了殘障權利行動的空間緊縮。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青年殘障者開始探索以多樣化的組織形式來探討殘障群體權利和進行權利倡議。本報告將主要分析兩個由青年殘障者成員構成的殘障組織及其核心成員的行動，一個是擁有 700 多位活躍線上社群的線上殘障組織 S，另一個則是正式註冊的、關注殘障女性的公益機構 B。同時本報告還將涉及在本年度內有廣泛影響力的青年殘障者行動。

一、主流殘障組織的轉變

2015 年之後，包括北京益仁平中心在內的多家權利倡導機構迫于政治壓力而解散，唯參與中國《精神衛生法》修訂的深圳衡平機構未遭此厄運。衡平機構的工作重心亦由在立法和司法層面倡議精神障礙者的自主決策權，轉向參與和支持精神障礙康復者的社區融合實踐。曾深度參與倡導行動的四位青年殘障者，則結成相對鬆散的倡導團隊，在 2015 年之後推動殘障者參與各類任職考試的平等權利，通過微信公眾號「殘障之聲」進行媒體傳播和線上社群動員。曾在北京益仁平中心及分支機構任負責人的程淵，組織和搭建了「殘障律師團」，由十幾位律師（近半數為殘障律師）接聽各地殘障者諮詢熱線，也為殘障倡導團隊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2019 年 7 月，程淵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刑事拘留，殘障倡導團隊和「殘障律師團」均受到波及。

此外，「老牌」的殘障組織在近年來經歷了轉型。在 2012 年作為 NGO 代表向聯合國 CRPD 委員會提交影子報告的「一加一」，成立了一加一殘障人公益集團，分支「有人基金會」和社會企業「其實諮詢」等。前者為基層社群組織提供 CRPD 推廣和培訓，並與哈佛大學法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有深入合作，向正式註冊的基層殘障組織提供小額項目支持；後者則主要為視力障礙者提供就業服務。2009 年工商註冊的、致力於開展法律服務項目和無障礙倡導工作的「亦能亦行」，于 2015 年前後淡出。2016 年，其發起人張巍成立了提供融合教育諮詢的社會企業，其核心成員呂飛則創辦企業，為雇主提供殘障者崗位開發、無障礙環境改造等支持。

2014 年，瓷娃娃罕見病關愛中心借「冰桶挑戰」風靡之機轉型成立病痛挑戰基金會，主要關注罕見病的醫療康復權利。他們在各地培育了一些罕見病病友組織，也通過影視和劇場等形式進行公眾教育，增強社群的自我接納和自我認同。

原武漢大學公益法律中心，曾以法律培訓和法律研究方式與民間權利型組織合作，2018 年其負責人張萬洪教授當選中殘聯權利委員會主任，並作為國家代表參與政府間殘障議題的對話，參與起草 CRPD 國家報告、國家人權報告殘障的相關章節，負責中殘聯的殘障就業修法的論證工作。殘障權利有了官方和民間對接的橋樑，但尷尬的身份又限制了該組織的獨立發展。

綜上，殘障組織的生存狀態可總結為：權利型組織幾近覆沒，僅存的組織將政策倡導的工作重心轉移向社區組織實踐；主流殘障組織以基金會、社會企業、服務型企業的樣態開展工作，工作的主要方式為培育基層組織¹、進行媒體傳播和公眾教育、為企業和雇主提供直接就業服務。新的青年殘障行動者和殘障組織，就是在這樣的土壤之上誕生和發展。

二、新型青年殘障組織的誕生和發展

從線上到線下：S 組織的誕生和成長

2016 年，曾有癩癩體驗的、海外殘障學在讀博士 Y 在社交媒體知乎創辦「殘障學討論」專欄，希望為社會大眾提供自閉症康復、海外殘障研究等資訊。Y 選擇這一平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知乎的主要受眾為青年人，且有高等教育經歷的使用者佔有一定比例。Y 發佈的專欄文章對大眾傳媒中對殘障者「同情、可憐、勵志」單一視角的反思、對殘障社會模型的解讀，擊中了一些具有同樣生命經歷、懵懂中亦在困惑的殘障青年，其中也包括高中生。很快地，專欄吸引了幾位早期的核心成員，也建立了有更多互動可能的微信社群 S，團隊核心成員開始運營微信公眾號。

知乎專欄的文章內容，既包括國外殘障權利運動歷史的介紹，也包括社群成員基於自身體驗、反思的隨筆和殘障視角下的影評。而微信公眾號的內容幾乎都是原創，既包括輔具選擇、出行建議、專業報考建議等貼近生活和學習需求的資訊，也包括針對一些時事和熱播影視作品的殘障視角分析。散落在各地的殘障者發現了一群有類似生命經歷的少數派，好像突然「找到了組織」，覺得自己不再是異類。

在組織創辦初期，成員間對於自我接納、自我認同的互相鼓勵，對於權利、現狀、自我認同的深度討論十分激烈。這種活躍的組織給了成員歸屬感，朋輩的支持也給因現實處境而長期自卑、怯懦的成員以信心和身份認同感。「殘障之聲」主筆 X 也是 S 社群的活躍成員之一，他坦言，「S 組織改變了我，讓我真正開始自我接納，開始放飛自我。」而初期他在群組中關於權利倡導的一些言論，引起謹慎的核心成員的排斥²，X 曾被誤會號召上訪而被踢出群組，在核心成員調查和瞭解後才被請回。如今，X 個人和 S 社群的核心成員是熟識的好友，殘障權利倡導的行動對 S 社群也逐漸產生影響。

到 2019 年為止，S 組織已有 700 多位活躍線上社群成員，其中約有一半是殘障大學生，也有研究者和公職人員，比如地方殘聯工作人員等。S 組織的核心運營團隊都是肢體障礙者。從高中開始深度參與的 Q，目前正在讀大二，是高考合理便利——為書寫不便者延長考試時間——的首批受益者；學習 IT 專業的 H 今年準備考碩士研究生；公眾號編輯 N 因為重度肌肉萎縮而導致嚴重的身體障礙，在家和外出有專門的陪護者，因為身體原因她沒有進入主流的學校接受教育，但她的文筆被社群公認為「溫柔而有力量」。另外還有幾位核心成員，有的在做程式師，有的則是在跨國企業工作，他們都是在工作之外兼職參與。

由於社群成員有很大比例的肢體障礙者，尤其是使用電動輪椅出行的「重殘」者，群體的無

¹ 受法律政策制約，基金會的主要支持對象為正式註冊的基層殘障社群組織，而大量的基層組織無法成功註冊。

² 微信群主對群聊內容的政治合法性承擔責任。

障礙訴求很明確。在成立的第一年，S 組織就針對高德地圖缺乏無障礙設施標識而徵集到 337 位社群聯署提建議，高德公司迅速做出了回應，並開始在地圖中標識了無障礙設施。S 組織成員初戰告捷，備受鼓舞。

隨著社群規模的擴大，核心成員對社群發展也逐漸有了更清晰的管理章程和發展規劃。加入 S 組織的微信社群，需要填寫申請表，核心成員的變更需要其他核心成員的同意，群組討論也有明確規則。除了群組討論，S 組織還有固定的圓桌分享活動。S 組織邀請嘉賓，在微信群裡文字直播課程，內容包括創業和就業經驗、獨自出遊的經驗等主題的分享和答疑，同時也包括一些權利理念分享和權利行動經驗總結。

在充分的線上交流和固定的線上活動之外，S 組織還會舉辦每年一度的線下周年慶典和小區域內的線下聚會，所有費用均自費、AA 制。線下聚會對於重度肢體殘障的成員而言是一種挑戰，既要衝破自我認知的限制和對未知環境的恐慌，又要應對家庭出於擔憂和不信任的阻攔。在 S 組織核心成員、自高中就開始深度參與 S 組織運營的 Q 看來，社群成員獨立出門和大家見面，本身就是一種能力和權利的覺醒和突破。同時，在公共空間裡同時突然出現十余名電動輪椅使用者，這對於公眾的觀念來說也是一種衝擊。

S 組織的線下活動，曾有一次獲得廣東某地殘聯的支持。殘聯的要求是將活動冠名在殘聯之下，但這被 S 組織的核心成員拒絕。「有人基金會」也曾有意支持，但 S 組織的核心成員始終堅持組織的獨立身份，「我們現在自己出錢也挺好的，不想被‘孵化’或者‘收編’。」³

多重身份的首次呈現：B 機構的創立和發展

90 後殘障女性 J，大學畢業後曾在「有人基金會」工作過一段時間。J 和另一位因罕見病而受障的大學畢業生 Y 一起開始籌備公益組織 B，這是國內第一次有民間組織鮮明地強調「殘障*女性」的多重身份和因此遭遇的多重障礙。

2018 年底，B 組織推出了線下殘障女性影像展，將十余位殘障女性的個人肖像、生活經歷以可視海報、簡短文字的形式公開展出。這是中國民間組織第一次正式地公開強調殘障女性這一特殊的群體身份標籤，在殘障領域引起了一次不小的轟動。

2019 年 3 月，B 組織終於成功註冊為社工組織，聚焦于殘障女性群體。B 機構的成員、實習生，大多是 90 後的殘障女性，她們以新媒體為傳播平臺，嘗試在女性主義視角下解讀女性殘障者的生命經歷，同時也持續在做殘障女性口述史的記錄和編撰工作。B 機構也和關注女性反家暴議題的法律服務組織、做殘障女性社群培訓的 P 基金會有多種形式的合作。然而，雖然正式註冊，資金籌措對 B 機構來說仍然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三、青年殘障組織及個體行動者的行動

S 組織：媒體倡導更進一步

四川大學 2019 年的碩士研究生招生簡章明確表明，因無法提供相應支持而拒絕聾人考生報

³ 來源於與 S 組織初創期核心成員 Q 的採訪。

考。S 組織的社群看到招生簡章後，當即向四川省殘聯電話投訴，同時也在社群裡號召其他成員去電話投訴。Q 同學也告訴了自己的老師，老師隨後聯絡到中殘聯的朋友來協調解決。迫于各種壓力，招生簡章裡的那句話一天之內即被刪除。通過老師的介紹，Q 同學認識了中央廣播電臺的師兄，接下來將和師兄的電臺節目進行合作，由 S 組織收集和編輯殘障者的故事在國家級的電臺節目中播放。

B 機構：從故事呈現到需求調查

在收集社群故事和參與組織線下培訓之外，B 機構的創始人 J 也和同樣關注殘障女性的某基金會合作，進行了殘障女性需求調查，收集到了幾百份問卷，並在國際殘疾人日發佈了中國殘障女性需求報告。⁴ 報告呈現了職場無障礙環境不完善、招聘差別對待和同工不同酬等就業歧視，以及受教育權利的支持不足等問題，為政府部門支持和完善助殘公益服務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青年殘障者個人的抗爭和發聲

在組織行動之外，回顧 2019 年對整個殘障領域影響最大的幾個事件，其中也有青年殘障行動者個人的身影。首先是兩名盲人青年對抗教師招聘的直接歧視，以下是他們的行動概況。

盲人青年鄭榮權，通過 2015 年第一屆盲人可以平等參加的普通高考進入大學，2019 年畢業後即考取了浙江省教師資格證。他參加了南京市某盲校的教師招聘，筆試面試均名列前茅，但最終因為體檢不合格被拒。⁵ 鄭榮權聯繫了「有人基金會」尋求幫助，他們聯絡到了中殘聯和江蘇省殘聯，為他入職一事和盲校協調。事件被主流媒體廣泛報導，也被央視新聞專訪報導。最終，鄭榮權進入盲校教書，個案獲得解決。但此事並未撼動南京市的教師招考體檢標準，或許鄭榮權本人也無意去擔當「前驅者」的角色去爭取制度性的改變。據瞭解，他本人認識殘障自倡導團隊，但並未向他們求助。有了解浙江省教師資格證考試標準的人士認為，按照浙江省的標準，鄭榮權應該沒有考教師資格證的資格，因為也會被認定為體檢不合格，他最後拿到了資格證，應該也是某種「特事特辦」。

另一位在 2019 年挑戰教師招聘體檢標準的是女大學生王香君。她是安徽省第一位通過普通高考進入大學的盲人大學生。⁶ 同樣因為被認定為體檢不合格，她應聘特殊教育學校音樂教師被拒。她向殘障倡導團隊求助，希望以個案推動體檢制度的改變。教師節時，倡導團隊協調了聯署建議的活動，這個曾經被權利型 NGO 常用的方式，在主流媒體最終的報導裡，卻不再被提及。像媒體報導其他和殘障有關的事件一樣，她的成長和求學經歷才是媒體報導的重點。

同樣的經歷、同樣的遭遇，兩位盲人大學生選擇了不同的路徑去解決。擁抱主流力量，還是信任民間力量？其中原因，當然也包括殘障者個人對「維權」風險的考量。

⁴ 正午故事：《國際殘障人日：不讓一個殘障女性落下，殘障姐妹們有建議》，2019-12-04，<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VI9M5G00534A4SE.html>

⁵ 民主與法制時報：《溫州視障大學生鄭榮權坎坷求職路：入職考試第一仍「不合格」》，2019-05-03，<https://new.qq.com/omn/20190503/20190503A08MBB.html>

⁶ 中國日報：《我從未見過光明，可我見過愛——安徽首位盲人高考生圓大學夢》，2015-07-16，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interface_toutiao/2015-07-16/13991157.html?tt_group_id=4727354414

除了爭取平等就業權，還有「紅到出圈」的青年殘障者。

潘潘是坐輪椅的 90 後北漂，也是關注殘障女性議題的 B 機構的公眾號兼職編輯，主業是在北京一家醫療機構工作。2019 年 7 月，在「截癱之家」創始人文軍因無障礙設施被佔用而不幸去世的事件發生後，潘潘在微博上發起了隨手拍的活動，希望號召公眾關注無障礙設施的建設和使用方式。小眾但口碑甚高的自媒體電臺「故事 FM」也播放了潘潘的故事。⁷

B 站博主大程子在杭州互聯網公司工作，她是 S 線上社群的一員，也參加過「有人基金會」的線下培訓。2019 年，她在 B 站業餘做直播，展示輪椅使用者的日常，比如如何開輪椅去上班，揭秘康復性醫療手術，也直播無障礙輔具展的現場見聞。因為成了「網紅」，大程子被更多殘障者認識，也常有人向她諮詢和求助。醫學科普大號丁香醫生為她撰文，讓更多讀者瞭解了大程子的故事，也瞭解到大程子所說的「殘障只是另一種生活方式」的理念。⁸

從 2019 年的行動梳理中不難看出，「講故事」是當前青年殘障者和組織主要的行動方式，也是被主流媒體和公眾接受的方式，無論是展覽、舞臺劇、廣播、新媒體推送文章、口述史、紀錄片等等，都是在用各種方式講述殘障者個人和群體的故事。

四、青年殘障行動者的機遇、挑戰和出路

機遇：議題發展空間大，政治敏感性低

雖然政府允許民間獨立力量生存的空間日益狹小，但本報告所涉的殘障青年行動者個人則鮮受來自地方政府或所在高校的管控。究其原因有三。

首先，因為群體身體特性的原因，殘障大學生的行動多在線上進行，很少在同一地區同一高校聚集做線下活動。而 S 組織的線下活動，常有一半時間是集體出遊，不涉行動導向的具體議題，因而不在當局維穩的範疇之內。

其次，殘障議題本身不敏感。一方面，殘障者長期的不利地位，讓殘障者的發聲對官方來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中國地方政府向來以發放福利的方式對殘障群體及其家庭進行「維穩」，所以當殘障者提出無障礙環境、合理便利支持等訴求時，當局更傾向於把它們當作福利性需求而非權利性需求，因而也不會把他們當作上訪或其他群體性事件的性質去管控。即便在 2019 年外部政治環境有變、國內趁機打壓權利 NGO 的狀況下，維穩人員限制某核心殘障倡導者出境時提到，「維護殘疾人權利沒有問題，但不能意識形態出現錯誤。」

再次，如前文所述，中國政府也會採取一些措施應對下一次國際公約的聯合國審議，在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而非人權標準的話語框架之下，地方政府和殘聯也在推動相關制度和服務的完善。從 2019 年相關的活動來看，殘障議題將來以主流方式推進的機會很大。

⁷ 故事 FM：《一個輪椅消費者的獨立北漂挑戰》，2019-07-15，[HTTP://storyfm.cn/episodes/e241-wheelchair-accessible/](http://storyfm.cn/episodes/e241-wheelchair-accessible/)

⁸ 丁香醫生：《故事|輪椅少女的飛馳人生》，2019-08-12，<https://zhuanlan.zhihu.com/p/77701775>

挑戰：資源缺乏和抗風險能力低

本報告所分析的兩間青年殘障者創辦的自組織均面臨資源缺乏的問題。S 組織的年度聚會大部分是參與者自費，僅幾千元經費來自「有人基金會」的小額支持，而國內一線城市只有較高檔酒店才有無障礙設施，這就使得個人承擔的成本較高。另外，相對其他人，青年殘障者的求學、求職本來就更加困難，當組織成員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和剛步入職場的畢業生時，他們不易的成長經歷也會讓他們對於外部支持、政治風險更加警惕。B 機構也是類似，雖然經過正式註冊，但並沒有更多的資源進行議題推廣的更多嘗試。

出路：外界提供技能培訓

對青年殘障者行動的技術支持可以從技能培訓著手，而非資金支持。技能可以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如何講故事，二是如何做基礎調研。

如前所述，當前青年殘障者和組織主要的行動方式是講故事，所以如何講好故事，或者青年組織如何培訓出更多社群成員能夠講出不賣慘、不勵志、能體現群體共性的障礙又有趣的故事出來，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需要一些更專業的培訓支持。而講好故事本身，既能促進更多青年殘障者自我接納和自我認同，使群體從身份政治中獲得更多能量，正視自己的需求並有力量去尋求改變；同時，也能促進公眾的觀念轉變和意識提升。

青年殘障者的意識覺醒後，門檻最低的參與活動便是作基礎調研，比如針對當地無障礙設施的調研，尤其是特定公共場合如高校、醫院、公共交通的無障礙調研。在未來幾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能會主動進行無障礙建設，但這必須吸納殘障者群體的參與，因為只有殘障者本身才最瞭解自己的需求，才最有資格評估設施的設計和建造是否合理，所以這樣低門檻的參與也會有一定意義。

第二部分 中國青年女權行動者報告

作者：中國女權行動者張累累

中國青年女權行動者的出現創造了中國女權運動發展的全新景象，但是隨著近幾年政治環境緊縮、政府管控加強，女權行動者們在個人和組織活動當中都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和無休止的騷擾，即便如此，她們依然在夾縫中尋求機會、探索新的出路。本報告首先回溯了這個群體組成人群的基本面貌、探索她們加入女權運動的原因，接著呈現了她們 2019 年主要的行動方式、專注的議題、如何進行社群建設，然後討論了 2019 年新面臨的官方管控如何對行動者開展工作以及女權組織動員社群設置了重重障礙，最後總結出這群行動者如今面臨的最大困難有哪些、需要哪些外部支持，以及她們如何把握還存在的機會。

一、青年女權行動者的群體面貌

這群行動者年齡在 22-33 歲之間，成長於從大小城市、城鎮、鄉村不一的背景，並非都來自中產家庭，不少曾生活在貧困農村。她們絕大部分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大學時期也成為接觸女權運動的起點。如今的她們，以 NGO 工作者、自由職業者、創業者等等各種身份形成中國女權運動者的核心群體。不同于同齡青年走上的精英路徑，她們選擇了邊緣又崎嶇的抗爭之路。她們從不同起點出發的經歷和探索，成為她們最終走到一起的原因。

雖然大部分行動者表示沒有經歷過非常「嚴重」的性別壓迫，但是當她們回望過去，還是會發現自己都曾不同程度經歷或者目睹過性別不平等的現實，潛意識都存儲著這些事實，而女權主義理念的出現讓這些事實得到了解釋和認知。其中一位行動者在童年時就意識到「女人是沒有財產的」，但是不覺得自己除了結婚還有第二選項的她，為自己設定的未來伴侶要求的是「不家暴的男人」⁹。從目睹自己同學父母的重男輕女、家庭裡面勞動分工的不合理、遭遇性騷擾，到被異性戀中心的浪漫愛情文藝作品洗腦、各個層面上被規訓怎麼做才是女生該有的樣子，以及加上性別因素之外的階級差距帶來的欺凌、童年經歷的家暴，這些行動者都努力地尋求資源和資訊去瞭解世界和追求自己的理想，通過如閱讀書籍、參加女權培訓或活動等方式，用女權主義的視角理解男權體制下的權力結構。

接受的高等教育為這些行動者提供了工具和資訊來源，而這和這一代女性可以接觸到更多教育機會有關。近幾年的資料顯示，高校當中的女大學生比例已經超過 50%¹⁰。她們是一胎生育政策最嚴格的環境中成長下來的一批人，雖然不能忽視計劃生育對女性的殘酷壓迫和對她們生育權的剝奪等罪惡性，但是某種程度上來說，一胎政策迫使很多家庭將自己的資源投向家中唯一的女性後代，讓她們獲得了更多機會去獲取理念和活動的資訊、去爭取自己的權利。

在這群行動者的探尋路上，最突出的一點，是她們對理想和價值的追求。她們當中有人從小個性充滿抗爭性、反對各種對個性壓迫的手段、追求人的自由，也有人堅信「人活著就

⁹ 來自對行動者的個人採訪。

¹⁰ 人民網：《女大學生和研究生比例達 51.7%和 48.5%》，2013-10-28，<http://edu.sina.com.cn/kaoyan/2013-10-28/1125399511.shtml>

要有理想」、需要尋找「年輕的激情」，有人嘗試了主流的精英道路發現並不適合自己，也有人希望自己可以從事的是幫助別人的工作。她們最終在一個充滿包容、相互支持和時刻反思的空間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從個人政治的實踐到公開場域的倡導，她們建立了緊密的社群。和由學者、律師、專家等精英人士形成的老一輩婦女工作者不同，她們相對來自草根、身處邊緣，但是極具挑釁性、身體性、批判性和創造性。她們將女權主義帶出小圈子，走進主流人群視野，當然也因為其高調的行動方式、組織能力和動員性，讓她們在這個各種社會力量都在被打壓的時代，經歷著各種阻礙和掙扎。

二、青年女權行動者的行動和組織

隨著近幾年政治形勢的惡化，青年女權行動者的活動空間驟然緊縮，2019年也進一步延續著這一趨勢。這意味著女權行動者們必須在不停應對政治打壓的同時，還要轉變行動方式和策略，在有限空間內繼續推動性別平等。

在行動動員層面，大規模動員異常艱難且風險巨大，不過行動者們依然會抓住時機果斷出手。2019年關於性騷擾、家庭暴力等的熱點事件依然頻發，行動者們會積極跟進事件，通過線上直播、即時組織線上討論的方式來深化社群和公眾對這些議題的理解。她們也會通過撰寫文章、製作電臺節目、錄製音訊課程的方式來理清論述、深化討論，還會通過許多跨組織、跨領域合作的嘗試，來重新整合資源和開拓新空間。比如，2019年在各地舉辦的中國Metoo展覽，就實現了和很多演出者、策展人的合作，讓Metoo運動的歷史做了一次檔案記錄和實體呈現，並且以這種方式繼續推動和曝光Metoo運動。又比如，她們和女工小組、各地的小組社團一起組織活動，以此來增進性別議題在其他空間內的可見度。

在具體的性別議題操作層面，女權行動者在就業性別歧視、單身女性生育權、性騷擾三個特定議題上面進行了深耕。在反對就業性別歧視方面，她們通過提供法律援助、個案援助和宣傳的方式來推動議題在法律、公眾教育和政策上的突破。在中國如今面臨人口老齡化危機、需要更多勞動力推動經濟的情況下，這個議題具有更多合法性，這從2019年初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門發佈通知規定用人單位在招聘過程當中不得詢問婦女婚育狀況的政策變化上可以看出。¹¹這樣的友好政策既是女權行動者的努力結果，也成為她們進一步開展行動的一部分空間所在，讓她們在個案跟進上取得了一些突破，獲得了包括央視在內的報導資源。單身女性生育權的議題，也因為中國巨大的人口結構壓力和較為友好的政策環境，得到了更多的曝光和支持。而像性騷擾這樣的議題，雖然敏感度加大，但因為公眾認知的提升，它依然有很強的關注度、聚集社群的能力和改變政策的趨勢。¹²

在具體的個案跟進方面，行動者們採取了兩種策略。一是繼續通過擴大個案的公眾影響和法律影響來提高公眾意識和推進政策和法律的改變。通過提供法律、心理、傳播等資源，行動者們跟進了包括職場女性生育被用人單位歧視、職場性騷擾、單身女性生育遭到歧視和

¹¹ 中新網：《招聘不得限制性別，不能詢問婦女婚育情況！國家九部門下通知了》，2019-02-2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6139573790430069&wfr=spider&for=pc>

¹² 上海市人大網：《構建“性騷擾”防治機制，上海市人大聯合協力廠商開展立法調研》，2019-04-01，<http://www.hainanpc.net/hainanpc/xxgk/dwxy/954338/index.html>

拒絕在內的個案，其中有些實現了突破。¹³ 二是提供具體的、陪伴的個案服務，比如對家暴受害者的支持和陪伴，通過一起去醫院、報警讓受暴婦女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支持，也可以改進警方、醫院在處理家暴案件方面的性別友好度。

在社群建設方面，雖然很多城市的線下活動頻頻遭遇阻撓，但是行動者們還是探索出了許多不同方式讓青年女性形成線上和線下的聯結。比如，通過女性領導力培育、建立女性共學社區、推出女權課程等形式，以一種更加具有合法性的方式，讓社群間對女權議題的討論可以更加深入和複雜化，也增進彼此的聯繫。另外，她們也通過登山、徒步等各種方式，在線上空間被壓縮的情況，另闢蹊徑，將女權議題加入進去，讓大家面對面地進行討論。原有的線下活動和戲劇演出等在合適的情況下依然在進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行動者在海外培育中國留學生社群，通過戲劇演出、工作坊、討論會等形式對海外的留學生進行意識提升和培養社會運動意識，用以回饋中國的女權運動，其中一些人在反性騷擾運動當中組織了大規模的動員活動。

相較于 2015 年前的高調挑釁，如今的環境讓行動者的行動策劃和組織動員被迫更加低調和分散，這使得大家調整了策略。首先，大家投入到更加深耕的工作當中，包括對議題討論和倡導的深耕和對行動者培育的深耕，使得性別平等在政治環境繼續惡化的情況下還能保持推動改變，並且培育更多的行動者去組織更大規模的動員。其次，多年在運動當中的磨練也讓這些行動者具有獨立培育社群的能力，即便被迫在物理空間上分散化，許多行動者也持續地在各自所在區域進行社群培育。再次，環境的變化讓行動者們可以突破原有圈層，和更多不同人群進行互動，也在嘗試重新定位自己在運動當中的身份、重新定位議題的走向。

三、官方的管控與壓制

從高校的管控來看，對於教師和學生的控制更加嚴格，因此高校的活動與思想傳播空間不斷被壓縮，學生的參與也更受限制、風險也因此增加。其中有在校的行動者在跟婦聯接觸和試圖就具體議題進行溝通的過程中，被婦聯的人員向其學校舉報，並受到指責和批評。

然而這批青年女權行動者大多已經離開高校多年，所以更緊密和頻繁的監視和騷擾多集中在非高校的核心行動者身上。中國官方對於女權行動者的管控手段在 2019 年是這幾年的延續和加強。最頻繁使用的手段是通過警察和國保部門對行動者周圍的人員進行騷擾，比如騷擾房東試圖讓行動者被迫遷離原來的住所，甚至通過頻繁的、無法擺脫的騷擾，讓行動者搬離原來居住的城市。今年更常用的手段還有騷擾行動者的原生家庭，通過激起行動者父母和親戚的恐懼來讓家庭對行動者進行控制，常用的手法是情感綁架，甚至有人身控制的情況出現。

除了騷擾周遭人員，對女權行動者本人的不斷約談和施壓的強度大大增加。在 2019 年下半年，大部分核心行動者都有不斷被約談，各種個人和工作上的活動都不停被限制的情況。今年新增加的針對女權行動者的管控手段還包括在行動者居住的社區、電梯口等地方設置監

¹³ 全國總工會：《上午查出懷孕下午就被炒，法院一審這樣判！》，2019-11-1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MzU3OTI5Mw==&mid=2247501504&idx=2&sn=f628bccf1df2ec4fdf0d546042df414e&pass_ticket=5rjXDEvUnyeWTUZUKPSmxF%2BxJNHeJAJJ%2BmlVwF6Zsk4nCcQCzSo%2FjYWfAY%2F6rfgx

控攝像頭，以此進行行程和來往人員的監控。隨著監控技術的發展和不斷被使用在管控上面（如人臉識別技術），行動者的行蹤和個人資訊都更加容易被即時掌握，警方就更容易針對行動者的行蹤變化針對性地實施騷擾。

除了行動者個人不斷被騷擾，線下和線上的活動空間也不斷被壓縮。除了緊密監控核心行動者發起的活動並立即設置阻礙，很多文化空間和場地也處於持續被監控當中，特別是會組織相對「敏感」議題活動的場地。加上許多文化空間在逐步被關停，行動者開展活動、尋找空間的難度大大增加。線上空間方面，審查在不斷嚴格化、細節化，長期的審查和限制甚至形成了一種不再容易引起異議的常態，行動者們會通過使用各種方式傳播從而拉長內容的存在週期，但是一些相對「敏感」的話題的存在時間仍然不容樂觀。

2019 年最值得注意的管控方式是對有行動導向的個人和組織進行針對性的打壓，通過密集的騷擾，將女權行動者（也包括其他社會力量）的組織打散，讓組織消失，讓個人處於孤立的狀態。MeToo 運動之後對相關組織的有針對性的施壓、在輿論上進行污名化（列為非法組織等），讓很多機構被迫紛紛關停。而對於剩下的組織，官方則會針對具體的人員不斷進行騷擾，讓行動者處於非常脆弱和被動的處境當中，很多行動者最後只能搬離所居住的城市。雖然這些行動者依然在保持相互的支持，以及會在新的城市展開活動，但是這種打散式的打壓對於運動還是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阻礙。

這些打壓手段對行動者的個人和工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斷地搬離、時不時地被侵擾，讓行動者們最基本的居住安全、作息安全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與原生家庭關係緊張會給個人帶來許多壓力和張力。這些方面都對許多行動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困擾，恐懼、抑鬱和憤怒會成為經常出現的情緒。除此之外，行動者的工作被常常干預，許多活動都在開始前或者中途被打斷，也給部分行動者帶來工作的猶豫，產生一些自我審查。另外，由於行動者和女權運動不斷被官方敏感化、邊緣化，很多行動者的身份變成「負資產」，在吸引社群的過程當中產生許多身份上的焦慮，很多資源也因為這樣的身份而不會流向至女權運動當中。許多新社群雖然有巨大的行動熱情，但安全資訊和培訓資源的缺乏也給個人和運動留下一些後患。

四、青年女權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青年女權行動者目前主要面臨三方面的困境。首先，因為打壓，行動者被迫分散在各個城市，並且需要以更加個人化（非組織、機構化）的方式開展活動，這給行動者們帶來了非常大的挑戰。個人行動者的身份無法獲得更多資源，個人行動者建立社群也面臨很多身份上的合法性的困境，同時個人還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在運動當中，從而也會相較于之前處於更加脆弱的地步。其次，因為對於境外資金的嚴格管控，以及身份上的敏感性不容易獲得境內的資金，許多行動者和組織都面臨著缺少資金的情況。再次，雖然中國對女權具有興趣的人群基數非常龐大，但是輿論環境的惡化使得許多女權群體被導向至更加簡單化、極端化、情緒化的討論氛圍當中。

鑒於此，中國的青年女權行動者亟需得到來自各方的支持。一方面是資源和資金的支持，讓運動可持續，讓行動者不再處於脆弱的處境當中；一方面是對於行動者們的心理健康資源

的投入，讓行動者們可以及時處理政治創傷，找到動力繼續開展工作；另一方面是安全和風險方面的支持，讓加入運動或者想要加入運動的女權主義者可以獲得比較充足和完整的安全培訓，在將來的工作當中可以有應對的方法和預防機制。

雖然面臨著巨大的困境，中國的女權運動以及其中的行動者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機遇和出路。第一，一些性別議題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使得開展工作依然存在著空間，在很多領域都缺少資源和投入的情況下，這些議題在填補著中國性別議題發展的空白。第二，雖然社群培育的難度加大，但是對女權工作具有熱情的青年女性不在少數，提供適當的機會，並投入時間培育，將會增加女權運動的有生力量。第三，雖然女權和行動主義被汙名化和敏感化，將一些議題和主題進行變體，或者開拓新的話題，比如開展女性領導力、性教育、女性心理健康、女性健康等話題的活動，還是可以創造不同的可能性。第四，孤立和分散的處境儘管難以避免，但是也促使行動者們走出安全區，進行更多領域的合作，擺脫原有的工作模式創造更新的行動方式，走出原來所在的區域在各個區域繼續開展社群的挖掘。

第三部分 中國青年勞工行動者報告

作者：中國勞工運動參與者

2019 年是中共建國 70 周年，這對於現政權的存續具有重要意義。同時，2019 年也是五四運動 100 周年，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就在中國高校中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學。在這樣的兩個關鍵時間點，為防止任何「不穩定因素」的干擾及蔓延，當局對青年行動者的打壓升級勢在必行。因此，2019 年對於中國的青年勞工行動者來說，可謂是「夾縫中求生存」，實為不易。本報告嘗試梳理青年勞工行動者在 2019 年的行動狀況和組織形態，以及面臨的困境和挑戰，同時指出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一、青年勞工行動者的群體面貌

這群青年人，從 1990 到 1998 年出生的都有，非常年輕、有活力。他們有的來自城市的中產家庭，大多是家裡的獨生子女，父母是教師或公務員。他們成長於相對自由的家庭環境，早期對於工人現狀瞭解不多，也沒有覺得工人跟自己有什麼關係。但從開始參與學校的「校工調研」活動後，他們就發現自己的生活其實從來就離不開工人，每天都在享用他們提供的各種便利服務。同時，他們也意識到，雖然自己的父母不是工人，但其實很多親戚也都在外打工，但以前從不曾瞭解他們。

還有更多青年勞工行動者來自普通家庭。他們的父母有的做小攤販，有的在工廠打工，也有的來自三線沿海城市（比如湛江、茂名、潮汕），以種植和捕漁為主業，也有的在碼頭做維修工人。因為父母外出打工，他們從小就跟著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長大，與父母聚少離多，可以說是留守長大的一代。也有一些青年人跟隨父母到了城市，在城市出生、成長。他們從小在父母的三輪車上、菜攤上過著黑白顛倒的生活。¹⁴ 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青年人深刻明白從外地到城市討生活需要克服的困難有多大，生活有多艱辛。不過無論是留守一代或是流動一代，他們的成長經歷都有利於他們理解工人群體。

這些青年勞工行動者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接受過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他們中有不少就讀或畢業于名校，或者有海外留學的經歷。有意思的是，他們參與到勞工工作的契機和理念卻並不一致，從參與動機來講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青年人參與勞工工作與他們就讀的專業有關。比如學習社會學、社會工作專業的青年人在學校學習到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相關的概念後，相信社會階層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而且這種不平等具有普遍性，但是這種不平等是可以被改變的；而學習法學和新聞學專業的青年人，因為在實踐中有機會接觸到工人相關的素材，所以對工人的權益狀況會更加瞭解。第二類青年人則受左翼思想的影響較大，他們學習馬列主義，覺得青年人應該關心國計民生，關心工農兄弟。第三類青年人覺得大學校園的生活太無聊，想找點事做，所以跟同學、學長參加校外的公共活動而慢慢參與到一些行動裡面。最後也有一些是想為之後找工作或深造、增加個人履歷資本而以實習生或者志願者的身份參與一些勞工機構的工作。

¹⁴ 菜攤一般凌晨 4 點開始營業，所以凌晨 3 點多父母就得去菜市場做準備工作，小孩困了就直接睡在三輪車上。

從參與程度來講，可以分為兩類青年行動者。受左翼思潮影響較大的青年人參與得更深入，他們會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理論支持，而且整個群體有相對穩定的網絡和組織。另一類是「非左翼青年」，他們關心社會，關心弱勢群體，關心社會不公，希望追求民主自由。這一類青年的行動比較個人化，會因為參與具體的事情而結識，事情結束後彼此之間只會有鬆散的聯繫，因而整個群體沒有明顯的組織網絡和群體領袖。

二、青年勞工行動者的行動和組織

左翼青年

從外部來看，「沉寂」可以說是左翼青年 2019 年後半年的主要生存狀態。他們很少參加公開活動，即便是參加左派或勞工的活動，也會以化名出現，就連關注勞工議題的資深人士也很難接近他們的核心成員。這樣做雖然可以保護他們在有限的空間裡存活下去，但同時也使得他們與外界隔絕，進一步陷入一種孤立的狀態。

從組織形式來看，高校左翼社團受到打壓後，目前已經不能繼續以社團的名義在校內公開舉辦活動，但仍有少數同學通過一對一私信邀請的方式在校外舉辦學習小組。學習內容涉及三農、國有企業、民族問題、工人問題、民主，以及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在內的民生問題。學習小組也會就當下的時事熱點開展討論和專題學習。這些青年熟讀《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矛盾論》等一系列馬恩毛的著作，也研究中國工運的歷史。他們還通過觀看世界各地與工運相關的影視作品來學習如何做工人的組織工作，比如韓國的《購物車》、《全泰一》，英國的《達格蘭製造》和阿根廷的《工人當家》。

儘管只能以非公開的形式存在，但他們仍然會開展各種活動。在週末和晚上的時間，他們會去學校附近的建築工地或為外來工提供服務的社區機構，為工友放電影、講新聞，輔導外來工孩子的功課。寒暑假的時候，他們會為外來工的子女舉辦冬、夏令營，與工友聊天訪談，進行衛生、法律知識普及等。另外，他們還會利用寒暑假時間進入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工廠打工。他們選擇的企業一般都是比較大型和知名的企業，比如深圳的富士康、惠州的伯恩廠、蘇州等地的知名企業。在工廠打工的時間裡，他們會與工人們聊天、交朋友、做訪談，瞭解工人真實的生活狀況。他們還會為某些行業工人開發專屬的手機 APP 或小程序，目前已有 5 萬活躍使用者。有一些青年人還選擇進入工廠當一名工人，與工人一起生活、學習、工作，在工廠裡面做一些組織工人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也有一部分剛畢業的青年人選擇加入官方的工會系統，一方面是為了瞭解它的運作，另一方面是想去影響和改變現在工會不為工人辦事的現狀，從而開闢一些做事的空間。不過因為後來官方工會知道有學生加入他們是「另有目的」，所以他們也開始謹慎聘請大學生，或者對大學生的背景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那些已進入工會的青年人覺得受到很大限制，所以也開始慢慢離開，官方工會對青年人的聘用政策也轉變為「只出不進」。

非左翼青年

與左翼青年不同的是，還有一些青年人在學生時代通過網絡（主要是微博、微信、FB）或校內外的組織，接觸到一些以建設公民社會為志向的 NGO 或個人行動者。他們被公民社會

的理念所吸引，希望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價值，進而參與這些機構組織的活動。在參與的過程之中，他們對勞工議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積極尋找可以進一步參與的機會。不過相對於左翼青年來說，他們的組織鬆散很多，一般只會通過聚會、爬山、讀書會以及共同關注的事件的方式來維繫關係和網絡。

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有自己的專職工作，在自己的工作裡面也體驗到公司對員工施加的各種壓榨。他們會用自己的業餘時間比較持續而深入地參與到公共事件之中。比如，他們會去工人抗爭現場寫報導，也會在勞工活動家被抓捕時參與到聲援營救工作裡面。他們也會與當地一些有影響力且仍然活躍的老一輩行動者有較多溝通和交流，從而獲得一些資訊和支持。

另外還有一部分是仍然在學校的學生，這部分青年行動者會通過實習、兼職或志願服務的方式參與勞工機構的一些協助工人處理個案的工作，比如工傷探訪、法律諮詢、為工人代寫法律文書等，希望在陪伴和支持工人的同時，也能提升工人的權利意識。

三、官方的管控與壓制

左翼青年

在經歷過 2018 年佳士工學運事件後，高校左翼社團受到了嚴重摧毀，幾乎可以用「連根拔起」來形容，很多耕耘多年的社團無法再公開開展活動。比如，北京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會因積極參與工運而被強迫改組；以校內工友為服務對象的中國人民大學「新光平民發展協會」則被暫停活動並被要求限期整改。

左翼青年也被公安和學校作為重點關注對象予以全方位管控。2019 年 4 月 28 日五四青年節前夕，五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成員（邱占毓、焦柏榕、孫嘉言、李子怡和王瀚樞）前往亦莊工地打工體驗勞動。然而在第二天早上八點左右時，全部人都「被失蹤」。不僅如此，左翼學生還遭到官方的進一步刑事抓捕。本科就讀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研究生就讀于中央民族大學的畢業生楊鄭軍于 2019 年 1 月 8 日晚間在廣州住處被 12 名警察強行闖入押走，隨後關押在深圳市第一看守所，8 月時被批准逮捕。除此之外，約談、要求刪除在社交媒體發佈的文章和言論、進行思想教育等管控手段也都繼續得到沿用。

高校也越來越普遍地使用科技手段和學生力量去實現其管控的目標。比如，校外人員進出校園需要刷臉或身份證；學校普遍啟動「學生信息監督員」制度，利誘學生充當眼線，以此來收集教師和學生的言論及思想傾向；在教室裡安裝監控攝像頭已經是標準配置，期望通過這個來獲得教師發表不當言論的證據，製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來逐漸禁錮教師和學生的思想言論，僅 2019 年被學生舉報且被懲罰的教師就已經超過了十人。對高校社團、社團學生領袖、高校教師和學生的打壓制造了一種寒蟬效應，使得正常的學生活動變得愈加地下化。

勞工機構

在當前的中國，只要有一點點影響力和群眾基礎的獨立組織或機構都會遭到官方的打壓。在 2019 年被抓捕的勞工人士當中，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關押的人數比過去都要多。與過去常用的「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名相比，雖然兩個罪名的量刑幅度差別不大，

但是前者對人的威懾力更大，因為當局可以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長期剝奪當事人會見律師的權利。而在公眾傳播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說辭特別能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信以為真，可以充分調動「小粉紅」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

有行動者在參與一段時間後因為感覺到無力而選擇離開。其中的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對行動是否有意義、能否真正帶來改變產生懷疑，每天面對的都是很沉重的話題，家人的不理解，對安全的考慮和自己身體精神健康的擔心，跟同齡人相比經濟狀況差距較大等等。但也有一部分行動者因為深度參與對勞工人士的聲援工作後，逐漸理解和認可了他們工作的價值和理念，從而在聲援工作告一段落後選擇進入勞工機構工作，或者成立新的機構紮根工人社區，繼續幫助和支持工人。

儘管官方對勞工行動者的打壓在升級，產生的影響也不見得全是負面。比如，大家在公共空間裡直播、討論、訴說自己被打壓的經歷，以此讓打壓的行為變得可見，這會讓一些「沉睡」的人覺醒過來，也因此可以聯絡到一些有共同遭遇的行動者。另外，打壓也讓年輕的行動者親自見證和體驗這個社會體制的荒謬和不公。之前他們以協助「弱勢群體」的動機參與到勞工運動，但那無論如何也是他人遭受了不公，而當打壓真正降臨在自己身上時，那種真真切切的體驗會轉變為成長的催化劑。

四、青年勞工行動者的困境和出路

客觀上來說，青年人在勞工議題上耕耘的空間是巨大的，因為中國有 2.8 億的打工者，600 萬的塵肺職業病人，每年因工傷切掉的手指超過 4 萬只，每年大大小小幾千起的工人集體行動。在勞資矛盾沒有得到緩和而工會又不能有所作為的情況下，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只要我們願意，總是能找到參與的機會。

但是，由於官方從 2015 年開始持續對勞工機構打壓，這些機構為了規避風險，也有受到資源收縮的影響，很多勞工機構不再能夠以組織的名義開展工作，而是採取化整為零的方式以個人名義、非公開的形式。或者，即便能繼續以組織名義開展工作，這些機構也在工作內容和重心上有所調整，去掉一些認為「敏感」的議題，或者只做不宣傳。這使得勞工機構更加邊緣和地下化，也更加孤立。

這樣的變化也導致勞工機構和青年行動者互相看不見，青年行動者的參與途徑比以往減少，獲取相關資訊變得更加困難，無形之中為青年行動者的參與增加了障礙和門檻。所以未來可以嘗試努力的方向可以是讓青年行動者和勞工機構多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結。

另外一個發展方向是加強勞工議題與其他議題的聯合。一直以來，勞工議題都是中國社會運動中「邊緣的邊緣」、「底層的底層」，再加上「左右之爭」，使得本來就很少人關注和參與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另外，勞工議題的行動者很多是工人出身，學歷、資源、論述、創新都不及其它議題的行動者那麼強，思想也沒有那麼開放和多元，接受新事物和適應變化的能力相對來說比較弱，所以，未來如果能搭建更多平臺將勞工議題和其他議題的行動者聯合起來多一些交流和學習，那將有助於勞工議題的行動者從自我封閉的隔絕狀態中走出來，也可以有能力和意識上的提升。

第四部分 中國青年性少數行動者報告

作者：中國同志運動參與者

2019年11月，18萬中國LGBT+社群參與《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法律修訂，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律意見。大量青年行動者參與到社群線上提意見、線下寄信的行動動員中。而另一邊，12月初進行的一次行動者自我照顧工作坊中，26名參與者中有22名青年行動者提及在過去一年曾被「有關部門」直接約談至少一次。

這兩個事件，同時反映了目前中國大陸性少數青年行動者的現狀與處境。一方面是外部政治壓力越來越直接地觸及到年輕行動者，不少行動者在剛進入行動領域的初始就須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另一方面，青年行動者依然活躍開展線上及線下的集結行動，在有限的公民社會空間中努力嘗試，動員社群參與或進行線上論述。這些較量與博弈，在過去的一年讓行動者感到艱辛、無力與孤獨，同時也讓他們在一有機會突破時更為緊密和團結。

本報告將對青年LGBT+行動者的行動類型和組織形式進行總結，梳理他們面臨的主要挑戰，並提出未來可以支持青年LGBT+行動者發展的方向。

一、青年LGBT+行動者及組織

LGBT+青年行動者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在校參與校園同志小組的大學生，二是參與到民間同志機構志願者的大學生和剛畢業不久的在職人士。兩者有交叉，也有過渡，當然也有些完全並不重合。

China SOGI Youth Network 于2018-2019年訪談了中國大陸50個高校同志團體的核心成員，梳理出目前校園青年LGBT+小組的現狀與特點。這些團體主要以某一高校獨立運作的學生小組為主，有14%為跨校的聯合小組。80%成立於近5年內。從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和武漢、西安等城市。該報告顯示，這些青年小組的核心成員多在20歲左右，就讀大二和大三的學生居多。而大學專業分佈較廣，以人文社科專業較多，尤其是社會學與法律專業，當然其中也不乏工科生。關於性傾向與性別認同，這些核心行動者以順性別為主，男同性戀占32%，女同性戀為男同性戀的一半，但異性戀也佔有16%，也有不少參與者自我認同為酷兒。

除了高校同志團隊外，也有不少青年行動者通過民間公益機構的平臺參與LGBT+議題的推動，包括在校大學生及剛畢業不久的青年人。這些年輕人以志願者、實習生或全職工作者的方式，參與NGO的具體工作。在校大學生參與到NGO的平臺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所在學校沒有LGBT+學生小組，所以一些較有想法的年輕人會主動去尋找NGO的參與平臺；另外也有一些是因為被NGO關注和推動的議題方向、工作內容所吸引，因為這與校園同志小組的工作內容不同，比如專門做跨性別議題的NGO、做法律倡導的NGO等，這些NGO為具有相關特長或興趣的青年人提供了專業的平臺。

基於高校的LGBT+青年團體最早成立於2005年前後，當時中山大學的彩虹社及復旦大學的

知和社為最早一批在校園開展性/別活動的學生團體。但近 5 年來才是高校同志小組較多成立與發展的階段。校園學生團體的成立與民間同志組織的發展息息相關。一方面，同志 NGO 舉辦青年人、志願者培訓，不少青年行動者在參與相關的青年行動者培訓後，在本學校發起同志學生小組。另一方面，由於本校有老師正在開設性/性別相關的課程（NGO 與老師合作的課程或老師自己開展的），得益於該課程和老師的支持，大學生們發展出青年同志小組。再者，同志 NGO 的倡導工作和公益行動是公開且可見的，這使得青年人有參與同志運動的途徑，從而選擇以志願者或實習生的身份參與到運動之中。

但也是從十多年前同志青年團體在高校成立後得到廣泛關注時起，校園同志團體因「青年」+「LGBT+」的雙重身份而一直受到學校打壓，發展較為艱辛。根據 China SOGI Youth Network 的訪談，在 50 個高校同志小組中，不到一半的同志小組在校園裡能與其它學生社團一樣順利註冊，多數小組與同志 NGO 一樣無法註冊成同志社團，甚至有兩個同志小組在註冊為學生社團後被強制註銷。由於沒有社團的「合法」身份，他們在校園裡開展活動遇到較大的阻力：一是不能公開在校園裡招新，新成員的吸收只能通過網絡進行或通過參加活動而加入；二是不能借用學校的教室舉辦活動，只能借用其它社團名義或在校外進行；三是不能在校園中舉辦較大型的活動、講座等，否則會面臨被輔導員或團委老師約談的風險。

即便如此，同志青年小組仍以不同的形式組織校園中的性少數學生及友好支持者進行運作。小組的活躍成員少的不足 5 人，多的達至上百人。多數社團的運作方式是一年年換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因此，活躍成員多為大二、大三年級的學生，只有少數幾家跨學校的同志小組的負責人仍為較高年級的學生或已畢業的人士。

二、青年 LGBT+行動者的行動

近兩年，隨著公民社會行動空間日益收縮，許多 LGBT+ 公益機構的活動受到較大影響，各機構均採取較為保守的行動策略，低調地開展工作，少有過去幾年較公開的倡導行動，青年行動者的參與缺乏成熟的平臺。然而，青年 LGBT+行動者及其團隊在面對各種外部壓力的情況下，仍大量堅持著校內外的行動組織及參與，活動內容涉及性別研究、社群服務、公眾倡導等多樣化的工作。

在過去，提高同志的可見度是校園同志小組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和定位，舉辦的活動包括在學校裡揚彩虹旗、騎彩虹自行車，在「517 國際不再恐同日」等特定日子裡的做大型的 pride 活動等等，以此來引發校園師生對於性少數話題的關注。但這幾年，這類活動往往會給學生帶來較大風險，或被輔導員約談，或被學校叫家長。比如，揚彩虹旗在 LGBT+運動裡曾是很重要的活動，但如今，學生一舉彩虹旗就會被學校盯上，從而面臨後續無法開展其它活動的後果，因此，校園同志小組的活動也轉向了更為地下和無聲息的（不喊口號式的）社群線下討論與聚會。一青年召集人在 China SOGI Youth Network 的報告中說，「要把彩虹旗的理念體現在每一場線下的社群活動中讓大家參與討論。」

目前，不同青年 LGBT+小組的工作主要包括同志學生社群發展、公眾教育/知識普及、調查研究、議題倡導、學生團體網絡支持等。

同志學生社群發展包括組織 LGBT+學生的線下聚會、交友、主題沙龍等，比如北京大學和清

華大學的同志小組曾聯合舉辦意定監護分享會，幫助學生瞭解目前對同志社群來說重要的法律。另外，也有個別性少數學生小組提供男同志 HIV 健康服務、熱線陪聊和心理諮詢服務，比如華中科技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同志小組均邀請過校內心理諮詢老師給成員帶心理支持小組。

公眾教育/知識普及包括面向高校學生和面向中學生的性/別教育課堂，包括線上和線下兩種方式，NGO 生產的一些認識同志和校園欺凌相關的資料也在高校同志團體中得到使用。在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是多數青年團體使用的方式，比如山東一同志小組經常結合與同志社群相關的社會事件進行撰文論述，從而引發公共討論。北京某同志小組發揮自身成員的長處，寫出「酷兒六講」普及酷兒理論相關知識。還有長沙的同志青年行動者會選擇在目前學生群體中流行使用的「QQ 表白牆」中推廣 LGBT+ 的相關資訊，已取得了較好的關注量。另一種較多嘗試的行動方式是青年人參與性/別教育課程的分享。一些青年學生團體通過開展同伴性教育的方式，將性別多元的知識內容放進性教育中，面向大學生及中學生開展同伴性教育。也有較多的青年人通過同志 NGO 的平臺作為志願者參與到性別教育的過程中。他們在 NGO 的帶領下進行性別教育相關的學習和訓練，並進入中學課堂去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和性別多元知識。

開展性與性別相關的研究是 LGBT+ 青年近幾年新發展出來的工作方式。他們有的在學校開展學生出櫃及校園欺凌相關的調查，有的在老師的帶領下做性別理論相關的學習和研究，還有的利用法律知識參與到法律倡導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有些偏學術，也有的會將研究轉化為文章發表，從而推動進一步的公共討論。比如同志組織在推動就業歧視法律案件過程中，法律專業的年輕行動者曾組織系列相關法律比較研究，通過撰寫法律文章的方式推進議題的公共討論。這是他們突出的優勢。

青年人在網絡公共討論的推進上也發揮了相當大的能量，其中較為核心的行動者多是經過 NGO 訓練的或與 NGO 有關聯的年輕人。比如，2019 年 4 月，新浪微博屏蔽了 #LES 相關議題，許多年輕人在網絡上討論、轉發。與此同時，在一次工作坊的行動討論中，來自某同志機構的志願者策劃了針對該微博事件的行為藝術，用口紅在嘴巴上劃 X，以此來表達被噤聲的女同性戀，並在網絡上號召大家參與。這一行動獲得了非常高的網絡關注度和社群參與度，而後另有志願者持續撰寫她們在這些被屏蔽的網絡空間裡的故事，這一系列行動為推動該抗議事件的發展帶來了許多行動的力量。類似的倡導行動有兩個特點，一是網絡聚集了非常多的年輕人參與，他們長期浸泡在網絡中，擅長網絡技術，在虛擬的世界中敢於發聲；二是利用個體行動介入公共討論並有意識地帶動更多人參與的年輕行動者多是經過 NGO 訓練的年輕人。

再介紹兩個議題倡導的青年行動案例。例一，在過去幾年的「反教科書汙名」行動中，在 NGO 的推動下，多地青年小組形成行動網絡，並在各自小組所在的學校持續開展「教科書去汙名」的行動。他們有的開展本校圖書館書籍描述同性戀的調查，將調查結果反映給校方，並要求更換正確描述同性戀內容的圖書；有的則向教務處及老師進行遊說，並成功向全校師生發送了正確瞭解性少數群體的內容；還有的與編者、出版社溝通，指出錯誤並要求改正；也有的成為了訴訟案件的當事人。在這一系列的行動中，各行動小組均在有明確目標及策略的規劃下開展行動，與偶發的一次性公共活動有所不同。例二，在 2019 年 11 月的《民法典》同性婚姻倡導行動中，大量參與動員的志願者均是在各同志機構充當志願者的年輕人。他們一方面利用自身在網絡上的傳播技能進行網絡動員，另一方面在線下帶動更多普通的在

地社群參與，最終帶動了 18 萬 8 千多人參與到該立法過程中。這在中國同運參與立法的歷史上是重大的突破，許多參與者表示，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與中國的立法進程。這些有組織的青年行動，顯然得益于同志 NGO 在幕後有規劃的推進。

最後一種同志青年的行動內容是開展各組織的網絡搭建、提供資源支持以及能力建設。由青年人支持青年人的方式來開展工作，是幾個青年網絡平臺團體的工作定位。有的團體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性教育網絡，它們可以籌集到較多資源去發展性教育的青年人行動網絡，並為該網絡成員提供培訓和資源支持。另有團體以 NGO 的形式開展工作，以促進青年團體的交流、學習和能力建設為工作內容，併發布青年 LGBT+ 團體的現狀報告，以此推動與他們自身發展相關的共同議題。

近年來，隨著同志可見度的提高，性少數年輕人出櫃的年齡不斷往前移動，許多中學生開始接觸同志公益成為志願者甚至月捐人。大部分年輕的同志習慣在網絡上發言參與討論，雖然也面對家庭及現實生活中的壓力，但因其日常生活的氛圍（尤其在城市中）相對寬鬆，他們也勇於向前走一步而參與到運動中來。這也意味著，同志運動的可見度，他們能接觸到性別運動資訊和知識的程度，非常影響這些年輕人的行動參與。

三、青年 LGBT+ 行動者的挑戰

同志運動本身受到的限制影響了青年行動者的參與

同志運動對青年行動者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運動提供的平臺。對比過去兩年臺灣因為婚姻平權運動的大規模動員，許多年輕人參與到運動不同層面的狀況，過去兩年中國大陸環境的收縮則讓各同志 NGO 無法開展較大規模的行動。許多同志機構轉向較內部和小規模的工作方式，這一方面無法將同志公益相關的資訊傳遞給更廣泛的青年人群，另一方面即使有年輕行動者希望進入同志機構有更深入的行動參與，他們也未能有較廣闊的平臺和空間可以發揮。

第二，運動理念和路徑。要開展權利導向的工作，在目前的運動環境之下並不容易，這一方面限制了同志青年的行動內容和對運動的想像，另一方面對性少數遭遇歧視的結構性根源，也難以開展討論，真正進行回應並推進改變。

第三，議題推動的深入及持續性。在草根行動空間有限的情況下，社會創新等新潮的行動方式得到較多空間和年輕人的目光，但這些行動方式往往回避了性少數群體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對於需要持續深入推動的議題，年輕行動者中間也缺少更踏實行動的氛圍和動力。在有眾多選擇的環境下，年輕人著重新奇的體驗，無法對同志議題進行持續深入地參與。

公民社會環境的收縮對行動者控制風險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對於青年行動者來說，管控的壓力主要來自于學校、家長和安全部門。學校主要通過輔導員、團委、黨委或保衛部進行干預。許多學生組織沒有風險評估和預防的經驗，社團剛成立組織了一次活動就被學校盯上。這不僅使得社團進入學校的重點監控名單，活動受限，而且也會讓社團成員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承受較大心理壓力。如果在學校這一關可以成功

應對，那學生身份的好處是學校可以成為他們免受直接外部壓力的避風港；但如果處理不好，那這也會讓他們面對更多來自安全部門或家庭的壓力。

過去幾年年輕同志行動者面對各方壓力的例子並不少見。比如，起訴教育部的大學生秋白，一開始輔導員為了限制其行動而多次談話勸說，未果之後告知秋白母親其女兒的同志身份並期望她阻止女兒行動。這一行為給秋白帶來了巨大的家庭壓力。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廣東另一高校的同志學生身上。在參與了同志學生團體的行動後，輔導員及團委老師將其限制在課室中，並連夜叫家長從另一城市乘坐飛機將其帶回家，最終導致該學生無奈退學。來自廣東外國語大學的某名拉拉行動者在畢業時開展公開接吻的行動後也引發學校關注，學校告知家長，最終導致家長報警，為原本在 NGO 做志願者的學生帶來了較大壓力。面對這些出櫃、退學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壓力，許多年輕行動者無法面對，長期處於擔驚受怕中，有的最終選擇放棄運動參與。風險評估越來越成為了青年同志行動及其團體開展每一個行動必不可少，甚至最為重要的考慮因素。

四、青年 LGBT+行動者的需求和出路

打開運動想像並落回腳下持續行動

面對有限的空間，我們需要有更多關於可能性的想像。這些運動的想像，可以是來自視野的開闊、看到各種行動的可能性，也可以是打破原有無法行動的思路、看見行動的空間和目前仍未觸及的可能性。但打開想像並不意味著抽離實際地開展行動。不抽離實際在這裡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對目前中國大陸同志面臨的實際問題有較多認識，對正在進行的大陸同志運動有所瞭解，以及對目前我們所處的社會及政治環境有所思考；二是對自己感興趣或需要回應的議題有較為深入的分析，並以持續開展行動的心態進行規劃和行動。這些思路，也間接地回應了風險控制方面的需求。不是說避開有風險的工作不做，而是從長遠的工作規劃出發，決定哪些是目前需要做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冒險。當然這是一個過程，行動者在行動的過程中學習和進一步理解所做的議題，亦是一種學習方式。持續性地、腳踏實地地開展細小的行動，在當下的環境之下是值得被鼓勵的工作理念。

搭建青年行動者與同志 NGO 的互動合作

如前所述，同志 NGO 的發展與青年行動者的參與息息相關。同志 NGO 在不同議題上的持續性推進，有利於青年行動者的行動，從而也可以更有效地推進議題的改變。若青年行動者的行動與 NGO 的工作和議程相結合，能使行動本身發揮更大的效果。而從青年人培養的角度來說，NGO 與青年人的互動合作更有利於青年人持續地得到支持和發展。搭建青年行動者與同志 NGO 的互動合作可以通過實習生項目、mentorship、合作行動等方面進行。

賦權工作能力的學習

除去如何進行行動策劃的能力，在目前充滿衝突、割裂的社會及運動文化下，如何開展對話、如何協作討論及聆聽、溝通，都是開展相關行動的重要能力。學會在社群工作中進行賦權式對話和小組推進，將很好地幫助青年行動者成為更有領導力的運動召集人。

創造在一起的機會

在上面列出的幾點建議中，並沒有專門關於風險控制的內容。當然，基本風險評估的技能是需要的，但不必陷入該問題的糾結中。除了前面三點都是很好的回應外，最後這一點——創造更多大家在一起的機會也相當重要。壓力環境讓行動者變得更加孤獨和孤立，行動者之間相互的陪伴顯得更為必要。找到更多同路人，可以使年輕的行動者更有活力和動力。而一旦有機會在一起聊天、討論，很多可能性將自然發生。

【完】